



贵州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 旅游人类学视域下的

## 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龚锐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贵州民族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贵州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 旅游人类学视域下的 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龚 锐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旅游人类学视域下的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龚锐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6  
(贵州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ISBN 978-7-5643-1800-0

I. ①旅… II. ①龚… III. ①乡村 - 旅游业发展 - 研究 - 中国②农村 - 社会主义建设 - 研究 - 中国 IV.  
①F592.3②F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0497 号  
-----

**Guizhou Minzu Daxue Xueshu Wenku**

贵州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Lüyou Renleixue Shiyu Xia De Xiangcun Lüyou Yu Shehuizhuyi  
Xinnongcun Jianshe

旅游人类学视域下的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龚 锐 著

|       |                                                                   |
|-------|-------------------------------------------------------------------|
| 责任编辑  | 刘 立                                                               |
| 特邀编辑  | 邱一平                                                               |
| 封面设计  | 墨创文化                                                              |
| 出版发行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br>(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
| 发行部电话 |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
| 邮政编码  | 610031                                                            |
| 网 址   | <a href="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a> |
| 印 刷   | 四川经纬印务有限公司                                                        |
| 成品尺寸  | 170 mm × 235 mm                                                   |
| 印 张   | 17.75                                                             |
| 字 数   | 318 千字                                                            |
| 版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次                                                   |
| 书 号   | ISBN 978-7-5643-1800-0                                            |
| 定 价   | 39.00 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 贵州民族大学学术文库编委会

主任委员：高万能 王凤友

副主任委员：唐建荣 刘黔生 刘 雷 杨昌儒

吴晓萍（常务） 范允龙

委 员：肖远平 周相卿 王 林 吴有富 杨正万 张艾清

石开忠 夏五四 汪文学 肖唐金 颜春龙 王建山

童 红 贺华中 任达森 王建平 龚 锐 岑燕坤

田 铁 索红敏 白明政 龙耀宏 张鹏程 张 平

何兴发 吕映红 王道铭 杜国景 管 兵 莫子刚

办公室主任：吴有富（兼）

办公室成员：柳远超 张琪亚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导 论                       | 1   |
| 第一节 旅游学对旅游的误解                 | 1   |
| 第二节 旅游人类学担当旅游研究重任的缘由          | 3   |
| 第二章 旅游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 17  |
| 第一节 旅游人类学产生的背景及历史沿革           | 17  |
| 第二节 国内旅游人类学研究概况               | 40  |
| 第三节 旅游人类学学科体系和优势              | 48  |
| 第三章 旅游人类学视域中的乡村旅游             | 63  |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濡化、社会化与涵化            | 63  |
| 第二节 人类学视域中的乡村旅游现象             | 67  |
| 第四章 乡村旅游及相关概念的再检讨             | 84  |
| 第一节 乡村旅游的概念内涵及特点              | 84  |
| 第二节 乡村旅游及其相关概念的比较             | 91  |
| 第五章 乡土中国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97  |
| 第一节 乡土中国                      | 97  |
| 第二节 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及内涵               | 108 |
| 第六章 发展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112 |
| 第一节 发展乡村旅游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 112 |
| 第二节 发展乡村旅游的意义                 | 116 |
| 第三节 发展乡村旅游与“三农”问题的关系          | 120 |
| 第四节 贵州地区乡村旅游与农业发展的案例分析        | 122 |
| 第七章 基于旅游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上的乡村旅游的文化经济互动 | 144 |
| 第一节 旅游人类学对有关旅游主体的研究           | 145 |
| 第二节 旅游人类学语境中的旅游影响研究           | 147 |
| 第三节 乡村旅游的文化经济互动论              | 150 |
| 第四节 乡村旅游开发的原则与对策              | 156 |

|                              |     |
|------------------------------|-----|
| <b>第八章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探讨</b>        | 162 |
| 第一节 乡村旅游的基本类型与模式             | 162 |
| 第二节 乡村旅游开发的案例分析              | 175 |
| <b>第九章 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乡村旅游形象建设</b> | 188 |
| 第一节 乡村旅游形象的概念与内涵             | 188 |
| 第二节 对好客文化的界定                 | 189 |
| 第三节 乡村旅游中好客文化的建设与保护          | 190 |
| 第四节 乡村旅游形象建设中的文化内涵           | 195 |
| <b>第十章 旅游人类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产品策划</b> | 198 |
| 第一节 乡村旅游产品的内涵                | 198 |
| 第二节 乡村旅游产品的分类                | 200 |
| 第三节 乡村旅游产品策划的基本原则            | 202 |
| 第四节 主要类别的乡村旅游产品策划            | 204 |
| <b>第十一章 旅游场域中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b>   | 235 |
| 第一节 发展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的意义         | 236 |
| 第二节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的原则、领域与方式     | 239 |
| 第三节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的特点           | 244 |
| <b>第十二章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文化资本研究</b>   | 246 |
| 第一节 关于文化资本的研究                | 246 |
| 第二节 文化资本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概念           | 248 |
| 第三节 乡村旅游场域内文化资本的理论预设         | 252 |
| 第四节 文化资本与相关资本拥有者的和谐构建        | 256 |
| 第五节 文化资本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作用          | 259 |
| <b>第十三章 乡村旅游与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b>  | 262 |
| 第一节 乡村旅游对传统文化的正向及逆向变迁效应      | 263 |
| 第二节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重建               | 266 |
| <b>参考文献</b>                  | 269 |
| <b>后 记</b>                   | 275 |

## 第一章 导 论

### 第一节 旅游学对旅游的误解

用旅游人类学的视野与角度考察旅游与中国社会,对于中国的旅游学研究而言,事实上动作已经过于迟缓。当我们断言旅游是在特定时代、特定场域、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现代社会现象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一时,其实我们只是道出了旅游的最一般的表现形态,旅游在这里似乎只是经济文化范畴的一种抽象。如欲对旅游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将旅游放置在时间的隧道中去考察,对它的发生或起源,对其内涵与外延,结构和层次的发展与变迁作出描述和解析,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得到一个包含着丰富的多样性内涵的现代旅游印象,即只有将旅游现象置于社会发展、文化变迁、经济提升等诸多“语境”中去审视、去考察、去体验,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准确、客观地解释旅游这一独特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本质。

正如罗伯特·朗卡尔在《旅游及旅行社会学》一书中所说“自有人类就有旅行”。自从原始人动身去寻觅为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充饥与遮体之初,就往往需要长途跋涉,旅行(Travel)就一直存在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旅行活动从未有过片刻终止,人们为了贸易、求知、探险、宗教信仰甚至战争不断地外出而行。在整个有记载的历史长河里,旅行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所指的旅游(Tourism),则显然是20世纪的现象。因为只有在工业或现代社会,旅游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现代旅游与国际化、全球化是联袂登台的。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出现了一体化与多极化两大趋势既彼此对立又交互影响的三个趋向。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所谓“雅尔塔”格局(“冷战”格局)之后,历史的进程已跨出漫长的“轴心时代”,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后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几大地地区性古典文明独占一方的孤立轴心现象已结束。地球上任何完全与世隔绝的文化也都将不复存在。一切边缘的,古老神秘的,过去不被纳入“主

流历史”的东西都因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断交往以及现代交通手段、传播媒介的日益发展而几乎一览无遗地展现在大众面前。每一种文化都既成为观察的主体，又成为被观察的对象。而旅游这个曾经是富有者享有的特殊权利和生活方式，在现代语境下，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正如罗宾·科恩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者对国际旅游业增长的进一步解释是，围绕着符号与意义的个人生活方式的认同是与不同的闲暇和消费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外出旅行与出国旅游被看做是富裕、复杂性和富于探险精神的象征。外国的风景、气候、烹饪和风俗为人们提供了新的领域和许许多多的机会，过一段异想天开的生活，以及假定自己在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环境下，扮演与以前完全不同的角色。随着国际旅游业的发展，“文化”已被包装出售给游客（以当代遗迹、仪式礼仪以及民间风俗的形式），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被作为商品向游客出售。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在大规模的大众旅游业已成为一项巨大的产业，并且具有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之时，旅游引发和派生出的问题也彰显无遗。比如旅游产业自身存在着多样性和分散性，使得旅游业的经济影响变得含糊不清。比如，旅游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市场的成熟，并落后于旅游者的特征和需求的变化。再比如，旅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旅游被认为是旅游目的地的掠夺者，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先导，甚至认为旅游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在某些旅游目的地似乎是虚假的。有些学者干脆称现代旅游为“帝国主义行为”，甚而认为这种大规模群众性旅游对东道主地方社会——尤其是那些非常小、非常单纯的旅游接待地的地方性知识是一种毁灭性的冲击与解构。再加上旅游行业很年轻（指大众性现代旅游的时间），人们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对旅游在一般认知上的误读，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的一些误解和错误认识：

**误解 1** 认为旅游是一项经济产业。而现实是旅游和旅游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只是旅游的外壳，文化才是旅游的内核。

**误解 2** 旅游业是“无烟工业”“绿色产业”。而现实是旅游对东道主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旅游的发展必须纳入到更加科学理性及可持续轨道上来。

**误解 3** 旅游业是一个“投入少，见效快，产出高”的产业。而现实是这种说法其实是在旅游业发展初期的概念，进入旅游发展的成熟期，旅游的发展要靠大投入才能大生产，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资本无处不在。

**误解 4** 旅游的目的仅仅是休闲度假。而现实是旅游是包括各种活动、各种目的在内的互动性活动。在旅游发展的高级阶段，旅游者与接待地民众

的文化互动，才是其最主要的目的。

**误解 5** 发展旅游就是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乡村旅游，对提高农民收入，拉动地方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现实是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推断和急功近利的操作造成了地方性资源被解构，传统文化的衰微，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旅游产品的格式化、雷同化，出现千村一面以及展演机制的程序化和“可口可乐化”。

## 第二节 旅游人类学担当旅游研究重任的缘由

历史呼唤着旅游人类学承担起如何将旅游发展纳入理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时代赋予旅游人类学以全新的视野去审视和研究旅游活动事象，现实昭示着我们必须对旅游业的发展投注更多的人文光芒。尽管我们都非常清醒地知道，作为旅游和旅游业这种如此庞大的系统是绝不可能单凭某一学科就能干净利落、透彻清楚地解决所有在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就目前的学科体系中，旅游人类学应算作是其中能堪当这一重任的学科之一，这是由旅游本身及旅游人类学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

尽管学界对于何谓旅游，即旅游究竟如何界定和释义莫衷一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本表述，但归纳起来，除世界旅游组织的技术定义外，不外乎“经济活动说”和“社会现象说”两大类。这两类学说都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欧洲。前者以意大利罗马大学的马里奥蒂（A. Mariotti）和奥地利的赫尔曼（H. Vonsellard）为代表，他们认为，旅游是外来人口进入非定居地并在其中逗留和移动所引起的经济活动的总和。而后者则是以德国的葛留克斯曼夫（G. Gluchsnan），瑞士的享泽克尔（W. HunziRer）和克拉普夫（K. Krapf）为代表，他们将旅游看作是非定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在当今西方经典的主流旅游学教科书的编著者当中，如克里斯·库珀（Chris Coper），罗伯特·麦金托什（Robert W. McIntosh），J. C. 霍洛弗（J. C. Houoway），伯卡特及梅德里克（Burkart & Medlik）等学者虽然对旅游一词的定义，都各有表述，但基本上属于或倾向于“经济活动说”。虽然德语国家的学者很早就曾提出过“社会现象说”，但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各种对于旅游本质的不同认识，构建了各种不同的研究框架和学术路径。对于旅游经济活动的研究是基于旅游者的动机、偏好和需求，以及旅游商的供给、生产组织和管理等。而对于旅游社会现象的研究则是基于将旅游作为一种特

殊的社会现象，即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在目的地流动、逗留而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即前者是对个体进行微观的内部机理的研究，后者则是对整体进行宏观的系统研究。

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两种学术框架和研究路径并不冲突，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相对峙的二元结构。旅游人类学作为独立的多元交叉学科，所关涉的或探究旅游的层面是多方面、多角度和全方位的。因此，它对旅游现象的整体论观点和研究视角有助于对旅游现象的探讨，并形成一些一致的观点。旅游人类学以宏观社会现象的旅游活动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探究旅游对游客和旅游目的地影响，但同时又会涉及对微观的旅游经济活动的研究。从根本上讲，旅游现象的出现是源于人的需求，有了需求才会有供给，才会有旅游服务诸多行业和社会的支持，而有了这些支持，旅游活动才得以成立，才会有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影响。因此，旅游人类学将目光和研究的主要对象集中到了三个方面。

第一，从旅游者 and 客源地角度出发去研究旅游活动事象。旅游人类学认为要探究因旅游者的流动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和问题，就必须以旅游者为中心，探究游客的旅游需求与旅游动机，并密切关注旅游企业、旅游开发商、旅游部门和地方政府针对旅游客源市场所进行的各种努力。也就是说，研究游客的旅游需求、旅游动机和旅游体验，并分析旅游对游客及客源地的影响，实际上是在探究旅游的文化、符号内涵。从这一研究角度出发，也符合文化交流双向性的要求。

第二，从旅游目的地角度进行研究。我们知道人类学一向强调对“他者”和“异质文化”的关注，强调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的研究，一直是旅游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内容。从“文化”和“社会”的不同角度去透视旅游现象，这是因为现代旅游的切入毫无疑问会引发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因而旅游人类学把旅游看做是一种涵化和发展形式，它会使得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发生变化。旅游人类学就将“他者”扩大到“东道主社会”的范围，进行“文化变迁”的研究。

第三，从旅游的运行即旅游业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现代旅游需要各类旅游企业和旅游部门为之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当我们将现代旅游活动放置在“旅游工业”的背景下来看时，可以清晰地看到，旅游活动是有显著的“世界体系”和“反一体化”的双重特征，在旅游活动中四处飘荡着“资本”和“权力”身影，这其中，旅游机构扮演了主要角色，不同职能的旅游组织与机构，对旅游政策的评估、咨询、决策等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旅游人类学自然会对与旅游产业相关的组织、机构及其机制，功能进行深入的研究。

旅游人类学研究旅游业并不拘泥于那些,如在实际旅游活动中的“吃、住、行、游、购、娱”等,而是从宏观的社会现象的视角出发,将旅游业放置在全球化场景和现代社会语境中进行综合考察,探讨旅游中的社会生产与商品交换、资本与权力的运作及话语权等问题,注重旅游企业中介商、旅游开发组织(含当地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东道主社会的发展,旅游与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存、生态保持、民族志旅游等方面的研究。旅游人类学也介入了对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进行评估和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讨论与决策当中。

旅游人类学之所以可能担当起对“旅游”研究的重任,是由旅游人类学学科特征所决定的。

如前所述,旅游人类学是一门多元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其学科特征表现为综合性,具体是指:

(1) 学科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旅游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过程,它涉及的是旅游者、客源地、目的地、旅游组织机构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这些具体的领域虽各有相应学科研究,但结合现实,从整体出发对旅游现象进行系统研究则只能是旅游人类学。

(2) 学科研究视角的综合性。旅游人类学在研究旅游现象及其引发的社会文化变迁时,并不是孤立地看待旅游产生的现象与问题,而是将其置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予以分析,尽可能运用不同的视角与看法,从多侧面对同一问题展开深入分析,注意个人、群体与社会各个民族间的有机联系。

(3) 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性。旅游人类学除综合了人类学、旅游学的研究方法外,还将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吸纳其中,全方位、多角度、多视野对旅游活动事象进行审视。正如旅游人类学的先驱瓦伦·史密斯以及莱特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旅游领域的研究中,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在于:它是否采用了全局性,跨文化、比较的观点与方法,以此来衡量某一研究是否属于人类学性质的研究。”

旅游人类学学科特征还表现为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族群、民族等。而旅游人类学则主要面对的是民族地区现实的旅游业发展及其给民族地区和各民族带来的影响。因此,现实性是旅游人类学的主要特征。这一方面强调的是对民族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另一方面指的是旅游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征,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旅游的影响会有所不同,不同的旅游方式也会对目的地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的民族地区面对的现实状况与文化传统亦有较大差距。而旅游人类学学科的综合特征,以及更加注重社会文化变迁的学科优势,对旅游业现实中存在

的问题，具有天然领悟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学科优势。

旅游人类学的学科特征更表现为实证性。旅游人类学是一门注重实证研究的学科，田野调查、实地论证是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旅游人类学既然在学科上定位于人类学的学科背景，必然会继承田野调查、实证研究的学科传统，求实求是其学科发展的根基。强调观察、调查、田野等获得“第一手资料”，从中检验理论假设。从而使得该学科在旅游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客观性和权威性。

此外，旅游人类学具有显著的实践性。如果说实证性侧重的是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那么实践性则凸显了这一学科的应用性。事实上，旅游人类学研究一开始就具有这两种鲜明的特性，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表征。基础研究包括对旅游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应用研究则是关注旅游过程中所出现的实际问题，着重对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的文化系统、社会认同、族群文化的多样性，东道主社会的发展、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社会权力、生态保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

旅游人类学之所以可能担当起对旅游研究的重任，也是旅游人类学学科的意义所赋予的。

第一，旅游人类学参与旅游研究有助于人们对旅游现象的认识。这是因为旅游人类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不仅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旅游者和他们的旅游行为，而且还能更好地理解和比较其中所涉及的不同生活文化形态，并能将各方都置于相互联系的整体中来研究，以此帮助解释各种复杂的文化及文化现象，为未来的旅游研究指出前瞻性的方向。同时旅游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使得这一学科能够对“异文化”社会有着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特质和优势。这就让我们可以通过各种个案的田野调查对东道主地区社会做更为翔实充分细致的研究，人类学对人类社会文化的研究，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观察和理解异文化社会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的原生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学事实上是从事人类各种社会之间的“跨文化比较”的研究工作。因此，人类学责无旁贷地把不同民族、群体在接触和交流中所发生的关系和变化以及这种接触和交流对环境 and 生态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纳入本学科的视野范围。而广义上讲，人类的旅游活动属于不同群体之间通过旅行而产生的接触和交往，由旅游活动所产生的民族之间、群体之间的交流以及这种交流活动给东道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自然属于旅游人类学首要关注的对象之一。由于有了从人类学角度对旅游的研究，人们了解了许多有关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形式和情形，特别是边缘的、欠发达地区的情形。同时，旅游人类学的学科意义还表现在对人类社会，尤其是对民族社会的主旨性分

析研究中，即可借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直接移植于对旅游的研究上。譬如，本尼迪克特有关社会族群和文化模式的“类型研究”可以被引入到对“游客/东道主”的社会特性的分析当中，而范根纳普的“通过仪式”则被运用于解释宗教上的“朝圣旅行”；特纳对仪式“阈限”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所形成的理论模式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此外，旅游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吸纳了其他社会科学中的方法和成果，表现出了具有开拓性的学科交叉和边缘特性，因此，其研究的视野和方向贯彻了以民族、社会、文化，特别是关于东道主居民的长远利益为原则，弥补了旅游学过于强调旅游的经济性的先天不足。

第二，旅游人类学参与旅游研究有助于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服务于旅游业。这是因为，旅游人类学对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能为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评估和开发提供科学依据。旅游人类学对客源地民族社会的认识能为客源市场开发提供针对性的产品与细化服务提供依据。旅游人类学参与旅游开发有助于在“标准化”和“差异性”之间寻求平衡点，即所创造的旅游产品既能让游客乐于接受又富含民族文化底蕴，能使旅游者感到与他所熟悉的文化有所不同。这样的创造过程不可能机械地延续任何一种文化的传统模式，而是创造一种不露痕迹的、多种文化互动的人为实体，这就得依凭旅游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进行指导。此外，旅游人类学的相关知识能够让旅游部门及其人员对游客的民族属性及东道地社会的民族属性有所了解，并提供相应的、恰如其分的服务。同时通过解读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旅游者能够减少在旅游目标选择上的盲目性，做好旅游的心理和知识准备，这样有助于提升旅游者的满意度。

第三，旅游人类学参与旅游研究有利于与旅游相关的民族社会的发展。以旅游人类学的一些理论观点来看待和分析旅游行为和当代社会时，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旅游行为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和冲击。这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客观、理性、科学地理解和处理旅游进一步发展所必然会带来的种种文化变迁、各种社会利益冲突，观察和解决随之产生的族群矛盾、地区利益纠纷等，都会起到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作用。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使旅游的发展变化能与我们当前的社会转型、文化变迁有机地结合，以达到互相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全体社会要素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共同目标。这就为有关旅游对民族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为民族旅游地以及所有旅游接待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方法及实践上的指导。即以人为本，注重保护社区居民的利益，强调社区参与，为民族旅游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旅游业发展中享有平等的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实践上的平台。

第四, 旅游人类学参与旅游研究有助于学科本身的完善与发展。21 世纪, 中国的旅游人类学如何面对这亿万民众卷入旅游活动的宏大社会现象, 如何参与并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转型中的社会现实是旅游人类学学科自身发展的绝佳良机。一方面, 众所周知, 旅游现象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的渗入, 加速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和文化变迁。由于现代性, 国家权力等因素的介入, 加之旅游业本身所具有的选择性大、操作性较为灵活等特点, 往往使旅游目的地在旅游开发、运作中呈现出颇具戏剧性的色彩, 目的地的文化因素在权力操纵之下频繁地被置换、重组, 进而至少在文化表象上呈现出纷繁复杂而又频繁变迁的文化景象。然而, 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变迁往往是一个动态调整适应的过程, 文化的变与不变, 其本质主要取决于民族主体深层文化意涵。置身其中的人类学学人如何调整自我的心态与身份, 在不忽略旅游接待地居民的声音的前提下完成他文化的表述、分析与批判, 已成为旅游人类学的一大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 旅游因其国际性产业的特征而具有了全球性的力量, 在这种国际性产业发展的冲击下, 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性文化呈现出了纷繁复杂的变迁场景, 宗教生活的再阐释, 民族经济的单元化, 资源的再分配, 权力的失衡与失范, 土地的日益匮乏, 以及其他更多的文化要素的重组,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后轴心时代”, 即全球化因素融汇在了地方知识与本土文化之中。此外, 旅游的发展使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在较短的时间内悄然发生并广泛延伸至文化的各个层面。而所有这一切恰恰为旅游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契机, 使得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段内通过参与观察, 了解到区域性社会文化——至少是文化表象上的变化, 从而达到“历时态”与“共时态”兼而有之的文化表述和文化再阐释, 以拓展旅游人类学学科的表述空间, 并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研究社会文化变迁提供具有建设性、权威性的民族志依据。

旅游人类学之所以能迅速融入对旅游活动事项的研究, 也是由旅游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演进过程所决定的。

“对于遥远的他乡, 人类学家有一种天然的向往, 他们渴望了解异域未知的神秘世界, 到处追寻已不存在的真实的种种痕迹, 以此反观自身的文化, 或者从异域他乡的文化世界中建立人类文化的普遍模式, 达成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是人类学家的文化抱负。”当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名著《忧郁的热带》中发出人类学家试图参与到对旅游活动进行观察与研究的诉求之时, 在西方, 事实上人们仍然关注的是旅游能给当地带来多少经济利益。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之后, 严格地说, 由人类学家所进行的严肃的有关旅游研究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1963 年, 人类学学者

努尼斯 (Nunis) 发表了一篇论文, 论述了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西方的旅游人类学学者一般将其当做人类学学者加入旅游研究的标志。”

事实上, 人类学家对旅游的早期关注与研究常常是描述性的, 理论研究相当少, 他们倾向考虑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到底是益是害这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人类学家之所以持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态度, 主要是由于当时许多人类学家对西方社会制度中权力机构的不信任, 特别是对那些在旅游目的地带有“文化帝国主义”性质的行为的憎恶。随着现代旅游规模前所未有的扩大, 使旅游人类学对旅游事项的研究着眼点, 渐渐从揭露事实的真相转变为对旅游负面影响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评论上。而由于旅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到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 主要涉及的是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影响方面的问题, 因此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也相应集中到了这个领域, 并已经和正在取得重要成果; 同时, 旅游人类学的主要突破点也集中在这里。

旅游人类学认为, 现代旅游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 而且充满了矛盾和各种利益冲突: 接待地社会文化商品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衰退问题, “伪民俗文化”的泛滥; 在一些市场经济不发达地区, 大量来自发达国家旅游者带来的异质文化的冲击, 使当地传统伦理观念、社会和家庭的传统凝聚力减弱; 与此同时, 由于旅游者的大量涌入造成接待地环境和生态遭到破坏, 动摇着接待地社会的整个基础; 由此而引发了旅游人类学对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激烈争论。如哈莱尔·邦德 (Harrell Bord, 1978) 在《面向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户: 冈比亚的旅游和发展》一文中, 对由外界刺激和外界导向引发的经济发展提出疑问。卢基西斯 (Loukissons, 1978) 在《旅游和环境的冲突: 以希腊马可纳斯岛为例》中指出, 旅游使该地区环境急剧恶化。皮·桑亚 (P. Sunyer, 1977) 研究了布拉瓦海岸地区的大众旅游, 认为它强化了陈规陋习。努尼斯 (Nunis, 1977) 对外来因素导致旅游目的地文化发生“可口快乐化”现象感到失望。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格林·伍德 (Green Wood, 1977) 在《切开零售的文化》中提出的, 他认为旅游使巴斯克地区阿拉德节日仪式商品化了。这一节日仪式深受当地人们喜爱, 凝聚了许多当地传统文化。人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市场机制中的一个元素是他无法忍受的。

与上述论点针锋相对的是“麦基恩 (McKean, 1976) 对巴厘岛, 科恩 (Cohen, 1979) 对泰国, 波斯维恩 (Boissenvain, 1987) 对马耳他和曼斯浦格 (Mansperger 1981) 对布拉瓦海岸的研究, 他们认为旅游是良性或者有益的发展途径”。

旅游人类学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成果终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这就是 1977 年史密斯主编的《旅游者与东道主:旅游人类学研究》(《*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人类学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领域内的研究开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提出了“旅游人类学”的概念。虽然这个概念在以前和后来都有人提到,但是首先以一本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包括 15 篇文献,分别讲述了旅游人类学理论的架构问题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行为的个案,以反映可能成为旅游学科中第一个学科分支的构想和框架的,就是该书。“该书被旅游学术届的权威期刊《旅游研究年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称为旅游人类学的里程碑。”

史密斯“里程碑”式的著作成就了旅游人类学的学术地位,也使得新兴的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更加明确:即其重点研究的内容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旅游者及旅游本身的研究;一是对旅游业的出现和发展给东道国地区带来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影响和研究。后者显然不定期包括了对旅游主体和客体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对前者的研究主要包括:什么是旅游者,他们的旅游行为和动机是什么,不同的需求产生了哪些不同的旅游方式,等等。由于这些问题涉及人类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如文化变迁、文化拒斥、文化互动、族群性、全球化、地方化、迁移、现代性、宗教、法律,等等。人类学家认为这些都是跨文化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旅游的意义,以及旅游给社会物文化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变迁。

旅游人类学对后者的研究即旅游业给东道国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文化上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旅游与文化涵化;旅游与传统文化;旅游与商品文化;旅游与民族工艺品的开发问题;旅游与民族文化重建问题;旅游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旅游与宗教的关系;旅游与性别角色问题;旅游与人口流动问题等。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随着应用人类学的迅速发展,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者也在增多,以美国加州大学为代表的教授群体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旅游人类学的一位领军人物是格雷本(Nelson Graburn),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教授,著名旅游人类学家。他在分析旅游现象时,提出了首先要了解与人类学有关的概念和方法体系。他在对旅游业的研究中,以旅游者的身份,结合自己对土著民族长期的田野调查,提出了民族志旅游。即旅游者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深入村寨部落,调查研究他们的社会与文化,发现他们的社会文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的巨大变迁,格雷本

在为《无包装文化》一书所写的序言,《民族旅游艺术品的再思考》等论文中,深刻分析了现代旅游给东道国与接待地区的艺术品发展带来的变化、转型及新的整合。他的另一篇论文《亚洲及大洋洲地区旅游与文化发展》,深刻地阐述了现代化与地方文化产生的碰撞、涵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文化转型;阐明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产生以及保持地方文化的重要性。此外,格雷本在其他的论著和论文如《旅游人类学》、《旅游:神圣的旅程》、《旅游,现代化和怀旧》、《旅游、休闲以及博物馆》等论文当中,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人类从事旅游业的目的、动机、行为以及旅游业与现代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其论点十分深刻、精辟。

旅游人类研究的另一先驱是史密斯(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其代表作是前文所提到的《旅游者与东道主:旅游人类学研究》,事实上这本书已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者的必读书本。该著作论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现代化与旅游业在文化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具体内容分为四大部分:① 旅游本质的定义;② 旅游业所产生的影响;③ 旅游业在不同社会中的发展;④ 从理论角度对旅游业进行研究。史密斯所著的另外一些论文,如《旅游:神圣的旅程》、《旅游业:一种帝国形式》、《从人类学角度谈旅游商品化》、《朝着理论的方向研究旅游业:巴利的经济又重性及文化的进化》等,成为旅游人类学的经典文章。

另外一位同样值得我们敬重的旅游人类学家,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系教授马康奈,他编撰了不少有关旅游人类学的文章和著作,其代表作作为《旅游者:休闲阶层的新理论》。该书分析了作为中产阶级的旅游者在旅游中的旅游目的和行为,即他们去旅游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一种文化经历,而在这种寻求过程当中碰到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关于传统文化的真实性问题。东道地区为吸引旅游者而设计了“舞台真实”,即设计所谓的旅游文化产品,以此来迎合各国游客,这对传统文化是破坏,还是保护?马康奈从社会、文化、经济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浓厚兴趣和注意。该书体现了这样一种主题思想,不同的旅游者对文化的真实性存在不同的要求。因此“舞台真实”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引起了许多后来研究者的争论。马康奈对“舞台真实”的深刻批判有着独创的理论和观点。

马格丽特·丝旺(Margarita B. Swain):美国人类学家,专门从事旅游业与旅游艺术品,旅游与性别的关系等研究。她曾长期在中国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重点研究游工艺品及人们性别在旅游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如论文《民族旅游在中国云南石林彝族地区的发展》《民族艺术品开发中的女性角色》《国家主义:石林的旅游和少数民族政策》等,涉及民族传统